

百年華章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系）
100周年纪念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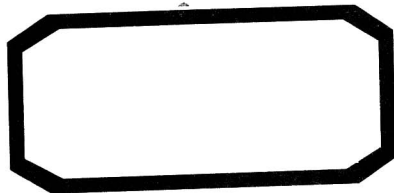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编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系）100周年纪念文库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系）100周年纪念文库

百年華章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系）
100周年纪念文集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年华章: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系)100周年纪念文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5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系)100周年纪念文库)

ISBN 978-7-301-20577-8

I. ①百… II. ①北… III. ①北京大学—纪念文集 IV. ①G649.28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79084号

书 名: 百年华章: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系)100周年纪念文集

著作责任者: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编

责任编辑: 马霄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0577-8/F·3170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926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邮箱: em@pup.cn

印刷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销者: 新华书店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本 23.25印张 577千字

2012年5月第1版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68.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系）100周年纪念文库

编 委 会

名誉主编 刘 伟

主 编 孙祁祥 章 政

编 委 （按照姓氏拼音顺序排列）

崔建华 董志勇 何小锋 林双林

平新乔 宋 敏 王曙光 王跃生

肖治合 叶静怡 张 辉 张洪峰

郑 伟

总 序

作为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学教育和科研基地,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是我国综合大学中最早建立的经济系科,也是西方现代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最早的传播基地。北京大学经济学科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1902年建立的京师大学堂商学科,1912年严复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始建经济学门(系),1985年又在北京大学经济学系的基础上组建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成为北京大学在改革开放之后建立的第一个学院。

1901年严复翻译亚当·斯密《国富论》(一名《原富》),标志着西方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正式引入,此后北京大学一直是中国传播西方现代经济学的重镇。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李大钊也是北京大学经济学系的教授;至1931年,北京大学经济学系陈启修教授首次翻译出版《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册,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面功不可没。因此,不论是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引入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播,北大经济系都是领时代潮流之先,在中国现代史中占据独特的地位。

拥有深远历史渊源和悠久学术传统的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在一个多世纪中涌现出马寅初、陈岱孙、赵迺抃、樊弘、陈振汉、胡代光、赵靖、厉以宁等在学界享有崇高声誉、学养深厚、影响深远的大师级人物,为我国经济科学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2012年是一个对中国经济学科发展有着特殊重要意义的年份,北京大学经济学科已走过了110周年历程,北京大学经济学门(系)也迎来100周年的隆重庆典。为了庆祝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系)创建100周年暨北京大学经济学科建立110周年,我院编写了这套《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系)100周年纪念文库》,旨在深入梳理北京大学乃至中国经济学科发展的历史脉络,展现北京大学经济学科的历史底蕴和历史成就,同时也希望从一个世纪的经济学科发展历程中反思我们的学术走向,为中国经济学科未来的发展提供一种更为广远和辽阔的历史视角。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作为中国综合性大学中最早的经济学科,它所取得的历史成就以及所走过的道路,必然对整个中国的经济学科发展有着深远的借鉴意义。

1917年,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对北京大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促进了思想解放和学术繁荣,奠定了百年北大的精神基调。今天,我们庆祝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系)创建100周年,也要秉承兼容并包的创新精神,在继承北京大学经济学科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以积极的姿态吸纳世界前沿的经济学成果,为中国的经济腾飞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我们经济学人应有的贡献。

孙祁祥

2012年1月15日

目 录

索怀往事感念多/胡代光	1
周炳琳与北京大学/张友仁	7
难忘的大学生时期/厉以宁	19
北京大学经济系系史小考/李德彬	33
北大经济系往事之一/李德彬	36
两进北大经济系/石世奇	41
兴旺发达 方兴未艾/石世奇	45
一生从教情未了/萧灼基	47
北大经济学系世界经济专业的成立与发展/张德修	54
熊正文赠诗/王梦奎	58
回忆导师陈岱孙先生二三事/申有之	62
弥足珍贵的迟来机遇/赖荣源	66
院系调整后北大经济系的教学及“三盘特菜”/丁国香	73
“文革”期间北大经济系的老师们/睢国余	76
我在北大经济学院(系)的学与教/李庆云	79
值得纪念的岁月/刘文忻	87
我与经济学院的点滴/刘伟	93
追忆陈岱孙先生/平新乔	99
学生的荣幸/平新乔	104
我读书时的北大经济系/王志伟	106
我和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经济史研究/萧国亮	116
回顾陈振汉先生关于创新理论的开创性研究/萧国亮 李连发	123
亦师亦友的洪老师/何小锋	128
厉老师和我的个人“危机”/何小锋	133
未来的路,其实别人已经在走/萧琛	135
那些人、那些事、那份情……/孙祁祥	139
投身经济穷韬略/叶静怡	147
传承创新开放包容的经济学院/李心愉	150
一张老照片,两位可敬导师:北大经济系之缘/王立彦	152
人才和思想的摇篮/王建业 李晓炜	156
世界经济专业的先生们/王跃生	159
有容乃大 受益惟谦/黄桂田	168
百年经院 弦歌永续/章政	174



追忆逝水年华:北大经济系 77 级点滴回忆/77 级同学	177
燕园风骨/田军	189
北京大学世界经济专业 78 级同学/田军	195
时代需要陆卓明精神/何志雄	202
永恒的记忆/郭广迪	205
从四院到东操场东/肖治合 张志方	215
燕园木槿花满枝/胡坚	222
北大最有风度的精神布施者/何志雄	227
追忆我的北大博士生活/刘向东	232
经济学院——我们安身立命的家园/钱立	240
流金岁月/刘怡	242
有多少岁月可以重回/崔建华	245
岁月的感动与感悟/吴侨玲	250
陈岱孙教授与外国经济思想史专业/杜丽群	254
借鉴他山之石,续写经济学院辉煌/孙薇	257
我在北大经院十四年/李虹	260
三尺讲台,万丈荣光/李权	264
我与经济学原理课/郭研	266
北京大学早期保险学科发展小考/郑伟	269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历史上的外籍教员/王曙光 孙家红	273
回望苍茫岁月:陈振汉先生的人生和学术/王曙光	280
青春的怀念/90 国经	292
院庆感怀:历史与现实/刘群艺	304
学生的增加值与我的价值/袁诚	306
财政学在北大的历史与发展/财政学系	309
北大经济学院学生二三事/宋芳秀	319
北大经济学科百年志感/孙家红	322
从一人的思想轨迹看社会发展的规律/兰莹	324
我与“经济地理”百年缘分/张辉	332
百年使命,令我担当/张洪峰	339
求真求善志清远/季曦	341
先生们的风范/颜敏	342
珍贵的回忆/张泽元 王晓萍	346
百年经院的魅力/杜浩然	356
雁留声妙如歌/朱健林	358
情牵北大/詹昊 胡蓓蓓	363

索怀往事感念多

□ 胡代光*

1953年春,我来到北京大学任教,一到北京西郊燕园,眼见校园湖光塔影,风景如画,顿觉这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的环境。岁月不居,时节如流,迄今倏已四十五年了。索怀往事,感念殊多,限于篇幅,只写下片段回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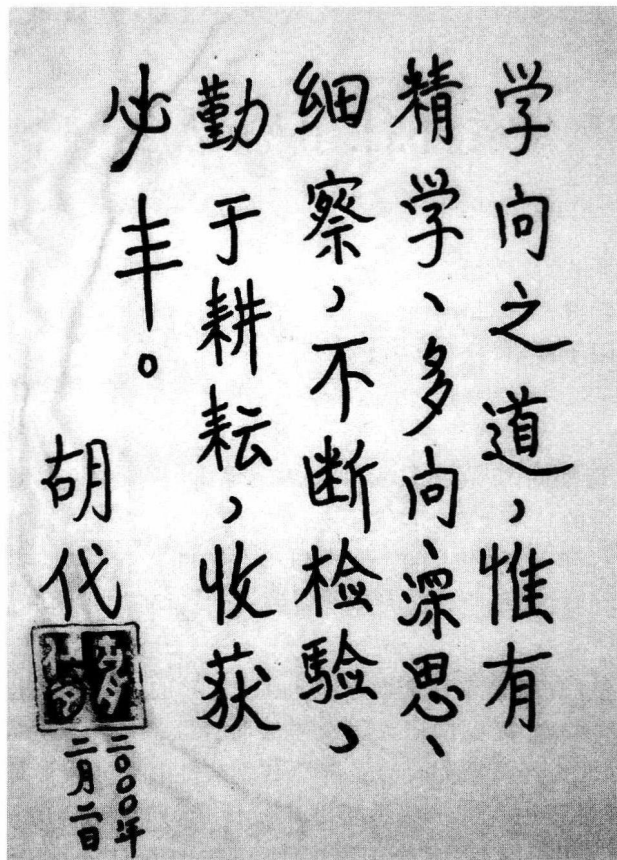
一

1953—1960年这段期间,我在北京大学经济系主讲统计学原理和经济统计两门课程,而且常是同时进行讲授的。从1956年秋开始,我还兼任经济系教学秘书,肩负着教学和行政工作双重任务,工作量确实是很重的。我夜以继日战斗在教学第一线,学习上孜孜不倦,工作上勤勤恳恳,为党的教育事业和北大经济系的教学、科研工作的开展尽到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全国高等院校调整后,高等教育全面学习苏联,我教的统计学课程也不例外。1954年这一学年,我每周既要用六小时到中国人民大学旁听苏联专家德米特里耶夫为研究生班讲授的经济统计,又需在北大经济系为政治经济学专业本科生主讲六小时的统计学课程,真是边学边教,在教学相长过程中我逐步熟悉了苏联统计学,并将所学应用于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当时,我多少也联系中国实际,结合国家统计局的一些统计资料和制定的统计报表中各种统计指标的计算方法,在苏联专家所讲授的经济统计课程教材的基础上,编写了我所使用的经济统计讲义,约二十万字。在“文化大革命”中,这部讲义已经散失,其实也不十分可惜,因为那时,我不过是“述而不著”而已。

如果说我研究统计学还有一点自己的独立见解的话,回想起来,1957年我写的《关于国民经济中平均发展速度的计算问题》一文(原载《统计平均数在经济分析中的应用问题(统计论文集之三)》,中国统计出版社,1958年版)乃是我较为满意的。在那篇文章中,我对计算平均发展速度的几何平均数法和方程式法做了较全面的比较分析,提出几何平均数法优越于方程式法的看法。我的最后结论是:“万能的统计方法是没有的。科学统计方法决定于被研究现象的本质及其特点。从某种意义上说来,几何平均数法本身确实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缺点。但是,如果我们注意到应用这个方法的基本条件——环比速度动态数列具有同质性,那么由几何平均法所求出的平均发展速度仍然有其客观物质性。相反地,平均发展速度方程式法却难免强套数学规律,有陷入形式主义统计的泥坑的危险。”

* 胡代光先生,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1985年北京大学经济系改建为经济学院后,先生出任第一任院长。本文是胡代光先生于1998年撰写的。



胡代光先生题字

二

1956年夏，我接受了中央农业部布置的任务，带领北大经济系一班学生来到山西省解虞县农村，调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情况。我们编写了许多统计报表并做出了一些统计分析，最后将这些统计资料上报给中央农业部，顺利地完成了任务。这是我从事统计学教学后第一次使理论联系实际，同时也是发扬北大严谨求实的学风，体现了教学与实践的密切结合。

1959年4—5月，我同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的两位同志再次到山西省晋城县周村“七一”人民公社，调查了该社上掌管理区的收入分配情况。通过深入了解，发现该管理区存在如下三个问题：

(1) 1958年的收入分配未能达到“90%以上的社员收入比上年有所增加，其余社员的收入比上年也不致减少”这项规定的要求；

(2) 由于公社化后取消了自留地并且社员已无条件 and 多余时间搞家庭副业，1958年社员人均全部收入水平未超过前两年；

(3) 1958年同1956年相比较，每劳动力所摊到的固定资产增长2.4%，每亩投工量增长

20.9%，而每亩耕地粮食产量则只增长14.2%，单位面积粮食产量的提高速度低于每亩投工量增长速度，使得每农业劳动日平均粮食产量降低了8.7%，每农业劳动力所生产粮食降低了11.7%。由于以粮食生产量计算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降低，每劳动力所创造的纯收入也随之而降低了12%。这些比例关系变化，说明了1958年农业技术装备程度的提高并未能发挥应有效果，对比1956年，活劳动不仅没有进一步节约，相反地，却降低了劳动效果，导致1958年社员收入尚未达到1956年水平。

我根据大量统计调查资料，针对以上问题，提出了一些分析性的意见，于1959年5月9日在“七一”人民公社就地写成了一万多字的《“七一”人民公社上掌管理区的收入分配情况调查报告》，回校后，曾打印出来。然而，由于1959年下半年在全国开展了“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运动，我的这份实事求是的调查报告也就只好束之高阁了。

三

1960年我开始担任经济系副系主任，并升为副教授。自此以后，我的教学和研究方向也转为当代西方经济学。早在1956年，北大就在国内最早开设了当代西方经济学课程，其时，首先担任这门学科教学和研究工作的是著名经济学家樊弘教授和徐毓枬教授，随后在著名经济学家罗志如教授的领导下，讲授西方经济学这门课程的共有四至五位教授、副教授或讲师，我分工主讲凯恩斯主义和经济计量学。20世纪60年代上半期，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的领导下，北京大学经济系罗志如教授与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的一些同志合作编写了《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作为全国大学文科开设这门课程的统编教材。这部教材共分五册（凯恩斯主义、垄断经济学、福利经济学、经济计量学和人民资本主义），由商务印书馆于1962—1964年先后出版了第一、二、四、五分册。第三分册福利经济学本来于1966年6月1日经过大家开会讨论最后定稿了，但当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突然播放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由此，震惊全国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形势突然大变，一夜之间，我也被打成经济系的第二号“走资派”；此后两年内，我作为被斗对象，参加了不计其数的大小批斗会，低头、弯腰、挂黑牌、“坐飞机”等，这是通常出席批斗会的方式。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当时的心情和思想状态概括起来有两点：

（1）总觉得这是一个冤案。我是终日辛辛苦苦，少睡多少觉，少度多少假，一心一意为搞好经济系教学、研究等工作而尽力，但目前却落得这样一个下场！谁想“复辟资本主义”？一切工作都是依照上级组织领导布置而贯彻执行的，我何罪之有！

（2）“文革”中，不少同我熟识的同志先后自杀了。噩耗不断传来，我自然感到悲伤，但我心想，不管怎样，我绝不能自杀，否则，我本来无罪也有“罪”了。我眼见“文革”那样闹下去，乱得党将不成党，国将不成国，终究不成体统。事物变化总有一个结局。我就是亲眼看看这场“文化大革命”究竟如何收场！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我在“文化大革命”后期，从感性上就觉得，“文化大革命”真是在历史上大闹一场的恶作剧；就我个人来说，确犹如做了一场噩梦。所以，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完全是应当的，而且是必需的。



摄于 2005 年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建院 20 周年庆典

四

1976 年 10 月,粉碎“四人帮”以后,经过拨乱反正,认真落实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北京大学获得新生,教育改革工作逐步走上正轨。1977 年,我重新担任经济系副系主任;1978 年 5 月 4 日北京大学八十周年校庆大会上,宣布了批准一批被升为教授的名单,其中包括了我。

1977 年以来,我又与其他几位同志共同讲授当代西方经济学课程。此外,鉴于近四十多年来,西方一些同情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积极开展了对《资本论》的研究工作,他们在研究中结合当前资本主义世界的现实情况而提出的一些探讨性问题值得我们注意和思考,20 世纪 80 年代上半期,我就专为经济系研究生班开设了当代西方学者对《资本论》的研究这门课程,我主讲此课程的目的是明确的,即为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们很有必要睁开眼睛来认真地、正确地和有分析地看待当代西方学者对马克思的《资本论》的研究和评论;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把我们掌握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水平提高一步,并使之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向前发展。这正是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面临的经济理论研究和使理论更好地服务于实践的一项严肃工作任务。

1984 年初,经济系主任由我担任,我的主要任务是积极筹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1985 年 5 月,经济学院正式宣告成立,全院分设经济学系、经济管理系和国际经济系,以及经济研究所,我担任院长职务。经济学院的建立促进了教育体制改革的进一步发展,并体现出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两大类学科的建立和教学并重,教学与科研相互结合,更有利于适应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才培养的需要。

邓小平同志早就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对提高我的思想觉悟大有帮助,对指导我们经济学院的教学改革起了重要作用。例如,北大经济学院在修改大学本科教学计划时,最早地将西方经济学分为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当代西方经济学主要流派三门课程来开设;对硕士研究生教学计划,明确规定无论任何专业,都必修读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资本论》专题研究以及西方中级微观经济学和西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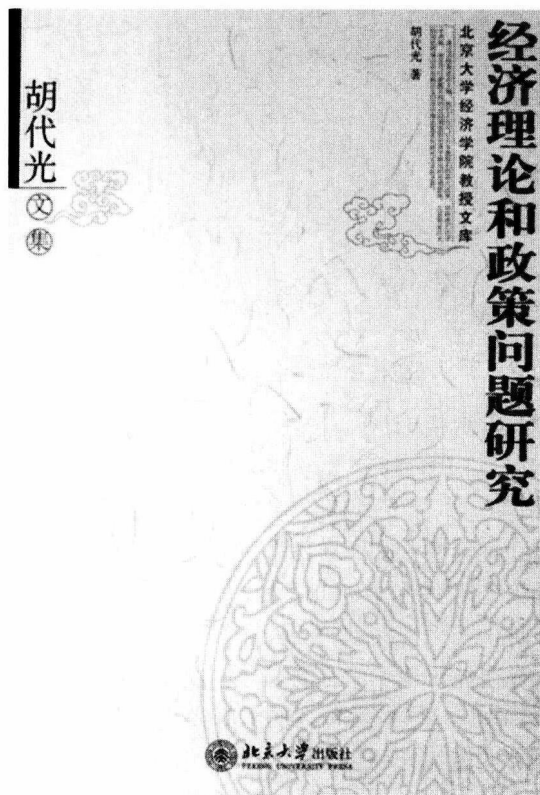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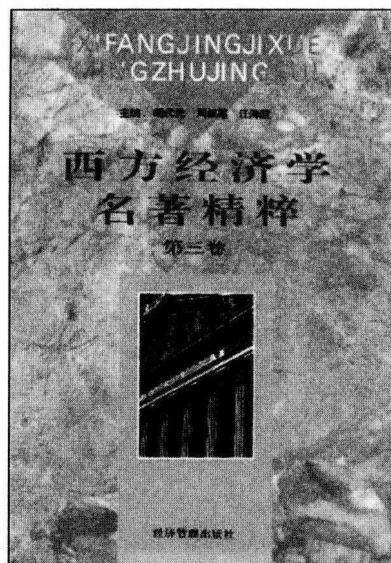
中级宏观经济学这四门课。这样的课程安排已延续至今,而且国内其他许多高校后来也仿照开设这些课程。在北京大学增设较多西方经济学课程的确是来之不易的。我们在进行课程教学改革的过程中,有段时间,突然有上级组织派人到北大各系进行调查,最后由调查者向我提出疑问,要我考虑是否存在办学方向问题,我当即予以否认,因为我觉得提出这样的问题,正是过去“左倾”思想的重现。又如20世纪80年代中期,有些高等学校因仿照北大增设了较多西方经济学课程,便受到批评指责,甚而决定停开西方经济学课程,担任这些课程的教师也在情绪、思想上紧张起来了,有的教师或打电话或写信来询问我:“北大将如何办?”我即回答道:“还是任随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胡代光和学生(2005年)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我听说,1983年初,在一个全国性座谈会上,有人反映我曾说过“不懂得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人,不能到北大经济系来工作”。反映者是以此作为我的一个错误言论,转告我的人还担心我会“背上思想包袱”,劝我“不用紧张”。我听后,坦然一笑,因为我不仅没有说过这样的话,而且我想,即使我真的说过这些话,那也是完全正确的。众所周知,马克思正是最懂得他那个时代和以前时代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伟大学者和革命家,所以,他才能同恩格斯一起创立了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今天,我们要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如果不懂得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确倒是很难想象他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必须密切联系实际,实事求是,通过实践过程不断发展。我认为,我们必须从“左”、“右”倾教条主义束缚下解放出来;解放思想≠思想自由化;马克思主义≠神学。只有认真地、实事求是地处理好这两个不等式,我们才能很好地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欣逢北京大学一百周年校庆时刻,我写下以上的片段回忆,意在有助于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现在,我们要学习好贯彻好党的十五大精神,那就必须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坚定必胜信念,为把北京大学真正办成世界一流大学而努力奋斗!



胡代光先生书影

周炳琳与北京大学

□ 张友仁*

周炳琳教授小传

周炳琳(1892~1963),字枚荪,浙江黄岩人。1920年,获国立北京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1922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后又入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法国巴黎大学深造。1925年回国,历任国立北京大学经济系、国立武昌商科大学、广州国立中山大学及国立清华大学经济系教授。自1932年6月任国立北京大学法学院首任院长,并长期担任此职。其间,兼任法科研究所主任及经济系主任,主讲社会经济史、经济学等课程,又曾出任国民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河北省教育厅厅长等职。1944年8月,担任西南联大法学院院长,兼法科研究所主任。三校回迁,仍任国立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1949年后,辞去院长职务,专任经济系教授,曾经主讲“外国经济史”等课,又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法文部分译成中文出版。

周炳琳教授自青年时起,就积极参加社会改造运动。“五四”运动中,成为著名的学运领袖,宣传布尔什维克主义,组织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归国后,加入国民党。北伐中,参与了收回汉口租界的斗争。抗战期间,担任国民政府参议院参议员,主张国共合作,倡导民主宪政,反对独裁统治,同情学生爱国运动。抗战后,拒绝参加伪国大,探求和平建国之路。解放后,曾担任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委员等职。作为一个爱国进步的学者,周炳琳教授为中国的社会进步与民族振兴、为北大经济学科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孙家红 撰)

一 周炳琳在北京大学的作用

北京沙滩(五四大街)中老胡同32号北京大学教授宿舍,是一处藏龙卧虎的大院落,里面住着二十多位北京大学著名的教授。

走进32号的南大门向西约10公尺是二门,乃一座垂花门。通过二门和第一个四合院,后面就是周炳琳教授住的10号宅。周先生当时是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法学院(下辖政治、经济、法律三系)院长,同时,还曾兼代政治学系主任和法律学系主任。他曾任国民党北平特别市党部委员,又是1931年以来的北大法学院院长,是北大大权在握的实权人物。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在1947年6月19日致周炳琳函中写道:

“现在北大的局面,尤其是适之先生在那里受苦,兄比任何人负责都多。”

周先生北京解放前后都住在本大院教授宿舍内的第10号宅,直到1952年10月北京院系调整后才迁往海淀燕园燕东园29号。在中老胡同,它的东边是北大文学学院院长朱光潜教授宅,它的西边是北大教育学系陈友松教授宅。我在这所住宅里见到过多位大学校长、文坛巨子、科技精英和革命将领等人物。

* 张友仁先生,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早年就读于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



早在1930年10月14日,南京政府教育部蒋梦麟部长电令周炳琳代理清华校长。周认为自己为北大毕业生,如果代理了清华校长,清华人将认为清华大学成了北京大学的殖民地,故坚辞不就。

早在1947年中央研究院院士提名时,胡适校长感到自己对社会科学界学科的人选不熟悉,特请周炳琳代为提出候选人名单。周炳琳于1947年7月12日致函胡适,信中写道:

“院士提名,承嘱提出人文组经济学法律学两学科的候选人。兹为法律学提了郭云观、吴经熊、刘志敷、李浩培等四人;为经济学提了马寅初、陈总[岱孙]、赵迺抃、杨西孟、蒋硕杰等九人。”

二 周炳琳和何思源

周炳琳(1892—1963)和何思源(1896—1982)是五四运动时期北京大学的同学。在北大周炳琳先读预科后读经济门,1920年毕业于经济系;何思源先读预科后读哲学门,1919年毕业于哲学系。他们都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在学习和运动中,他们结成了亲密的同学和战友关系。

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周炳琳留学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又留学英国伦敦大学的政治经济学院、德国柏林大学和法国巴黎大学等著名大学;何思源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获硕士学位,又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德国柏林大学和法国巴黎大学等著名大学。

1929年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周炳琳、何思源等十二位代表反对二陈(陈果夫、陈立夫),在大会上大吵一场后立即退出。从而,他们本来已被内定为中央委员的,就都被取消了。

回国后,周炳琳历任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组织部长、清华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教授、法学院院长、河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南京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兼副秘书长等。

何思源历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图书馆馆长、法学科主任、训育部副主任、北伐军政治部副主任,当时北伐军政治部主任人选空缺,由何思源主持工作。后任山东省教育厅长等。当何任北伐军政治部副主任时,曾经请周炳琳帮助推荐人员到政治部工作。

抗日战争开始后,山东省政府主席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不战而放弃山东,1938年1月被蒋介石枪决。这时作为一介书生的何思源竟组织武装队伍,开展游击战争,收复了半个山东省,被蒋介石政府任命为山东省政府主席。当他赴重庆述职时,被在西南联大任教的周炳琳教授请到昆明西南联大向全校师生作了精彩的报告,缕述他在山东开展武装斗争,部队被击溃之后,再组织,再击溃,再组织,终于取得胜利的经过。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派嫡系军人接管山东,何思源被解除了山东的军政大权,改派到北平当一位没有军权的北平市市长。1946年秋天的一个晚上,何思源乘飞机刚到北平的当晚,就同他的法国裔夫人一同到中老胡同北大教授宿舍看望老友周炳琳、魏璧夫妇,他们用法语亲切交谈,何对周视同自己的兄长和老友,既亲密又尊敬。后来何思源夫妇住入中南海内西花厅,他们和周炳琳夫妇仍有经常的来往。西花厅的沙发座椅,每次坐下都会弹一首歌曲。何思源在北京饭店屋顶花园上举行宴会,也曾有周先生夫妇参加。

周炳琳夫人魏璧女士是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曾留学法国里昂大学、巴黎大学学习数学。



这时她闲居在家，何思源提出要请她出来担任北平的一所女子中学的校长，但是不得调换原有的总务主任。魏璧担心如果财务上出现问题，将由她自己负责，而没有接受该校长职务。

在解放战争时候，“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尖锐的斗争”，“逐步形成反对蒋介石统治斗争的第二条战线。”（《蒋介石政府处在全民的包围中》，《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23页）在北平的历次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中，周炳琳都要关照何思源：你作为北大的校友，一定要保证学生的安全！何思源也积极和周炳琳保持联系，力图防止和制止国民党特务对广大学生做出暴力的举动。何思源在1948年4月12日致教育部朱家骅部长和胡适校长的密电中写道：

“源[何思源]随时与梅生[枚荪、周炳琳]、宜生[傅作义，华北剿总司令]、自昭[贺麟，北大训导长]保持联系，力谋平息途径。”

1947年5月20日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中，国民党特务数百人埋伏在西单路口的瓶颈地带，准备袭击游行同学，周炳琳急电何思源，一定要制止流血事件的发生。经过何思源的多方努力，特务队伍终于在游行大队到达前从西单撤除，使游行队伍得以安全通过。

1947年6月2日反内战日，北大民主广场举行反内战死难军民追悼会，北大被反动军警特务的铁丝网和沙包所包围。特务还围攻北大学生宿舍西斋，周炳琳在大会上作报告后急电何思源市长到北大景山东街（现名沙滩后街）解救。何思源及时赶到，北大同学围着他向他控诉特务暴行。他的专车被群众围困在北大西斋门前，无法启动，车的左右踏板上各站有警卫一人，他们急向天空鸣放驳壳枪多发，车前才稍有空隙，得以冲驶出去。

1948年底和1949年初，周炳琳和何思源都从事北平的和平解放工作。他们组织成立“华北人民和平促进会”，1月16日该会推派何思源、周炳琳等作为代表，赴香山访晤叶剑英，商谈和平解放北平问题。何思源积极从事北平的和平解放，尤为蒋介石所痛恨，1949年1月蒋介石密令处死何思源，并以此警告傅作义将军。此事由保密局毛人凤局长派行动处叶翔之飞赴北平指挥，并派能“飞檐走壁”的飞贼段云鹏等人夜间潜入东城区锡拉胡同何思源宅，炸死了何的二女儿何鲁美，还炸伤了何夫人和其他子女何鲁丽等5人。何思源受伤后，头颈双臂双手都缠满了白纱布白绷带，忍着伤痛及时来到周炳琳宅，向周报告受伤的经过。那时何还不知道是定时炸弹炸的，而说：“蒋介石要杀害我们。他用小钢炮（迫击炮）把我全家打得非死即伤。你老兄也要加倍小心啊！”

解放后，他们都是民革中央委员。何思源曾入华北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晚年为中央文史馆馆员。周炳琳仍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任全国政协委员。

魏璧女士在十年动乱中不幸逝世，1979年1月由中共北大党委统战部和九三学社共同举行的她的追悼会上，何思源曾亲临吊唁，并且用流利的书法一笔签下了他的三个字的名字。

1981年5月27日，北京大学举行“赵迺抃教授从事学术活动56周年庆祝大会”。何思源说赵迺抃是我的老同学，我一定要来参加。他坐在主席台上，因年事已高，提前退席。我送他到北大办公楼东门坐在石台阶上等车。由他在北大读书的外孙去找出租车，找了很久才找来车，将他送回北河沿民革宿舍。

早在抗战以前，何思源教授就有一牛皮箱（西式）的书籍寄存在北平史家胡同56号周宅，胜利回京后也没有取回，解放后也没有取回。直到周炳琳教授1963年逝世后，又经过十



年动乱，周炳琳家所存书籍都到了北京大学图书馆书库。文革后经周恩来总理办公室批复，将周炳琳的书籍发还，由其子周浩博领回。何思源的这一箱书则仍存在北大图书馆，内有何思源著的《经济统制论》（精装本）等书，直到70年代末，才由何思源派人到北大图书馆领回。他的著作还有《国际经济政策》、《社会政策大纲》、《中国人口问题》、《近代中国外交史》、《欧美各国社会之发展》、《求生教育与教育保险制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等。

三 周炳琳和傅作义

傅作义将军对北京大学素来是有感情的。1936年8月北大教授胡适等就曾随傅作义将军赴绥远省大青山凭吊过“抗日阵亡烈士公墓”。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对蒋介石实行“兵谏”，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自由等主张。从1936年到1937年傅斯年陆续写信给胡适和周炳琳，向他们通报西安事变和南京政局。信中称胡适之为先生，称周炳琳为枚荪兄，并且要将这些信件“看后焚之”。1936年4月“冀察政务委员会”与日本秘密签订“华北防共协定”。宋哲元的第29军是参加过长城抗战的军队，在5月30日的干部会上，军官们反对脱离中央。胡适在31日晚写了与宋哲元书的草稿，征求周炳琳的意见后，以《敬告宋哲元先生》发表：

“我们深信，在这个时候，国家的命运已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候，凡是反对中华民国的人，凡是有心破坏中华民国的统一的人，都是存心遗臭万年的人，我们决不可姑息这种人，必须用全力扑灭这种卖国求荣的奸人。不如此的，在今日是汉奸，在中华民族史上永远是国贼。……熙洽、张景惠、殷汝耕都没有力量，因为他们都脱离了国家的立场，所以永远成了汉奸国贼，他们不能不托庇在敌人的铁蹄之下，做了受保护的奴才。这些奴才将来都有在中山墓前铸长跪铁像的资格。我们这个国家现在虽遭厄运，是决不会灭亡的。我们不可不明白这一点；一切脱离国家立场的人，决难逃千万年的遗臭！”

1948年7月24日周炳琳在《新路》（周刊）第1卷第11期上用笔名发表《傅将军面临一个考验》一文，文中写道：

“他人不能打胜仗，傅将军独能打胜仗，只这样便足以引人入胜。……‘七五’惨案发生，考验之期不旋踵而至，我们仍然爱护傅将军，希望他拒绝拖延的办法，迅明断然地处置，为公道求直，为死者伸雪，以争回动摇的人心。”

1948年夏天，傅将军到中老胡同32号来拜访周炳琳先生。那天，周不在家，周夫人魏璧女士见到传达室送来的傅作义将军的名片，十分着急，叫我出去替他应付。我走到大门外，看见傅将军穿着灰布军服，坐在吉普车的司机座旁边，后边还有几位替他带路的北大学生。我告诉傅将军，很抱歉，周先生不在家，他才离去了。

四 周炳琳家的客人

早在抗战前《清季外交史料》巨著的编者王亮（希隐）先生就曾来访周炳琳先生。他当时是北京灯市口育英中学的董事长，我是一年级学生，他来校视事时，在校长室约见我，对我多方加以勉励。他在民国初年任职外交官，曾出使20多个国家。